

許舒博士與乾泰隆商業及土地契約文書

蔡志祥

1988 年我從日本畢業返港，在香港政府檔案處工作。有一天，許舒博士來到檔案處，問我有沒有興趣替他整理編輯一批他收集的、和乾泰隆有關的土地契約文書。乾泰隆是香港其中一家最早的南北行。從 19 世紀中期開始，乾泰隆以香港為中心，開展了一個跨國的聯號網絡。然而，那個時候，我不僅對商業史一竅不通，也不太認識香港的都市和商業的發展，更遑論和乾泰隆有親屬和貿易網絡關係的潮汕和東南亞地區。然而，一方面因為在東京求學時，參加了由佐伯有一及田中正俊等教授主持的「土地契約文書研究會」，瞭解到契約文書對理解中國地方社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因為許舒博士是我敬重的前輩學者，我就欣然答應了編輯這批文書。我用了十多年時間，前後編輯了以下兩部文獻資料集：

《許舒博士所藏商業及土地契約文書：乾泰隆文書（一）潮汕地區土地契約文書》（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センター，1995）【下文：《文書 1》】

《許舒博士所藏土地及商業文書：乾泰隆商業文書》（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華南研究叢刊四，香港：華南研究出版社，2003）【下文：《文書 2》】

編輯資料並不困難。但是，要明白契約文書背後的地方、人脈以至宏觀經濟的關係則需要長期的資料搜集和田野調查。就如許舒博士在為《文書 1》寫的序言中指出，「……所有這些文獻需要考慮其背景脈絡。較諸可以確定土地契約文書相關的

家鄉，那些缺乏脈絡關係的（契約文書）就顯得沒有很大的價值。能夠確知在契約文書裏提到的相關的人所屬的宗族和村落，就顯得更為重要。」（《文書 1》，頁 xii）他認為契約文書必須交叉驗證，從產生文書的家庭、機構以及商業組織的歷史和運作，才能更有效的知道地方社會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情況，以及商業活動的內容和規模。（《文書 2》頁 ii）這批許舒博士從摩羅街 (Cat Street) 和荷里活道 (Hollywood Road) 的故紙店中買回來的契約文書包括了 230 份土地契約以及政府機關的收條之外的 848 件商業文件。土地契約包括了 148 次交易中附交的上手或再上手契約。最早的土地契約是 1796 年訂立，最晚的是 1949 年訂立。商業契據包括了 376 件公司記賬記錄、189 件銀行或錢莊票據以及 283 件商業契據。這兩批資料提示了同一商人家族在商業貿易以及在家鄉的活動。研讀和排比這些資料，研究者可以從中得到一個 19 世紀中葉以來跨國商人家族的跨地域的、聯繫華南僑鄉和東南亞的整體觀。同時更可以從貫時的比較，觀察到網絡、關係以至商業、土地制度的變化。很多華人的家族企業都不傾向保存他們在作業過程中產生的檔案資料。因此，研究華人家族企業可以說是相當困難。許舒博士收藏的乾泰隆文書，雖然不可能包括這個商人家族活動的所有資料，但是仍然可以說是相對的完整。從文書的交叉對比中，我們可以提出不少有意義的問題：如（1）通過土地買賣的契約討論女性在大部分男性出洋的僑鄉社會中的位置；（2）家族企業怎樣利用關係和制度來進行跨國的貿易；從土地買賣的時間上和價格上，（3）如何理解尤其是在地域社會遇到天災人禍的危機時，資本家如何在慈善以及利潤之間取捨；（4）跨國商人如何通過建立聯號的關係，在不同的地域、國家取得最大的利潤、減低交易成本和風險等等。

總言之，許舒博士為後來的研究者保留了非常重要的文獻資料。乾泰隆文書只是其中的一批。除了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學文獻中心出版的由黃永豪編的《許舒博士所輯廣東宗族契據彙錄》（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センター，1986及1987）外，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也整理出版了兩批許舒博士收藏的契約文書。【劉志偉編，《張聲和家族文書》（香港：華南研究出版社，1999）；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商業往來文書》（香港：華南研究出版社，

2003）；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1893-1935年結簿》（香港：華南研究出版社，2003）】。檔案資料的匯集、保存當然很重要。然而，資料的整理和第一手的解讀，對年輕的研究者尤其重要。許舒博士給了我這個重要的鑰匙，為我的研究打開了很多、很多的門。對於帶領我走入商業史、家族企業、僑鄉和東南亞研究的恩師的離去，我只能默禱他遺留下的寶庫，為更多的後來者打開更多的門。

2023年7月29日寫於新加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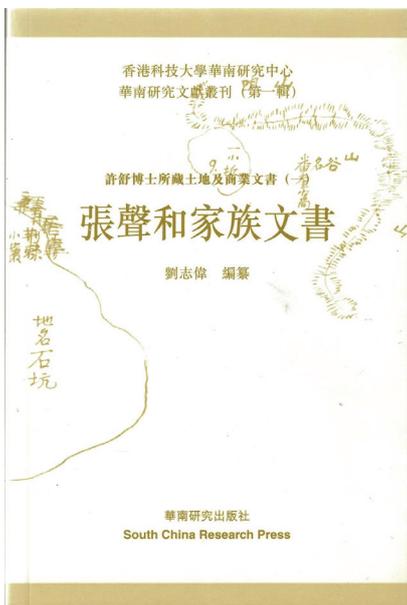


圖3、《張聲和家族文書》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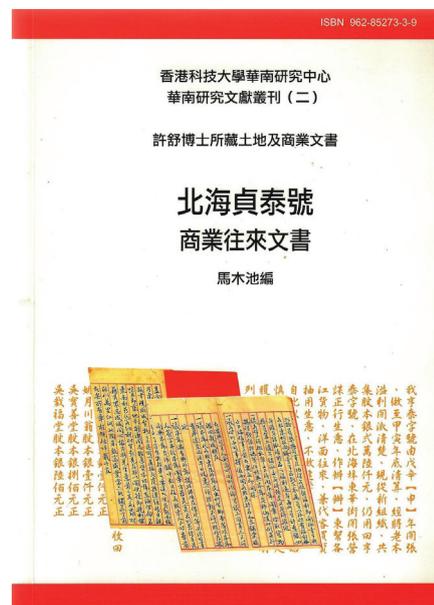


圖4、《北海貞泰號商業往來文書》封面。



圖5、《北海貞泰號1893-1935年結簿》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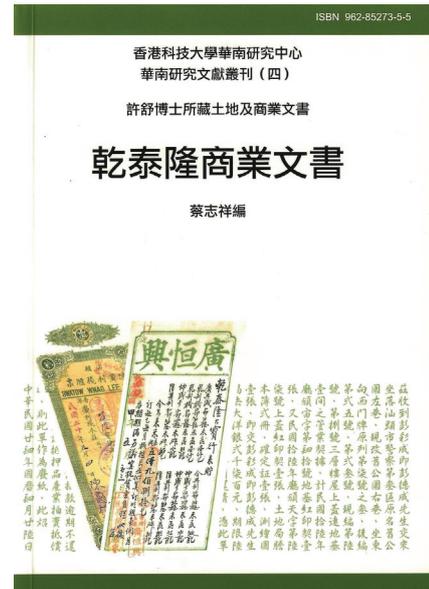


圖6、《乾泰隆商業文書》封面。